

。日本學者近年亦有在這方面合作，大量翻譯佛教經論爲現代日本語，如長尾雅人、梶山雄一監修，中央公論社發行的「大乘佛典」叢書，即是這方面的顯著表現。它的特點是譯者都有很好的語文根底，能依原典來翻譯，故可以說相當忠實于原著。至于在宗教上思想上的發展，則唯中國佛教特重。西藏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再述，及其資料的保存。日本佛教則一向是跟中國走的，在觀念上縱有創闢，例如道元的佛性論，但大抵來說還是中國系統的延長。朝鮮佛教亦是中國系統。

最後是研究的語文。這幾乎全是歐美和日本學者的天下。歐洲人搞佛學研究，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，日本人則後來居上。其研究成果，自然是以其本國的語文來表示。故倘若不懂日、英、德、法諸語，則難以談現代佛學研究。

由上面可知，佛學研究與這麼多的語文拉上關係，要全部籠罩它們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通常一個佛學研究者，只能兼顧與他的專長有直接關係的語文。如研究大乘學者則習梵、藏、漢、日語，研究小乘學者則棄藏語而習巴利語。英、德、法這些歐洲語文，自然是要具備的。上面提到過的 Edward Conze，在東方語文中，便能通梵、巴利、藏、漢、日、蒙古語諸種。他的佛學專長是在般若文學方面，曾編了一本學術水準相當高的「般若文獻辭典資料彙編」(Materials for a Dictionary of the Prajñā-pāramitā Literature)。不過他在義理上的了解，却只平平而已。DeJong 氏亦精於東方語文，又通歐洲方面的古典語，如希臘文、拉丁文，但他却極少表示自己在義理方面對佛學的了解，只好寫書評而已。他的最大成就，恐怕是月稱 (Candrakīrti) 的「明晰的語言」(Prasannapadā) 的部份法譯，那是譯自梵文原典的。

精通各種語文是歐美及日本佛教學者的共同特色。這不獨是風氣使然，而在大學中亦皆有學習這些語文的有利條件。不過，由重視語文而引出的另一面惡果，恐怕亦爲兩方所不能免。這即是于義理方面不能兼顧的問題。語文是工具，其重要性自不能忽略。但語文不是哲學，弄懂了字面的意思，并不表示已掌握到內

裏的哲學涵義。一個佛教學者，倘若要花上多年的時間去搞通那些如梵藏的艱難語文，則餘下來供自己作思考作體會的時間便不多了。而佛家的哲理又是那樣深奧難窺！結果都是文獻學家。一般來說，西方及日本所謂佛教學者，大抵都是文獻學家。Conze 與 DeJong 自不必說，即鼎鼎大名的日本的宇井伯壽，在日本與西方都是學界的祖師，但他寫了一部「中國佛教史」，便只舖陳宗派史事，于各宗派的觀念的把握方面，了無精采。中國佛教雖非他的所長，但由此亦可見他治學的歸趨。日本龍谷大學二十多年前出版的「佛教學研究法」一書，收錄文章十五篇，談的幾乎全是有關文獻的事。

文獻學與哲學兼備的學者不是沒有，但總是少數。如上面提到的 Stehnbatsky 與 Frauwallner 等便在西方開一風氣，從比較哲學的角度來談佛家的論理學。日本方面亦很有一些較年輕的學者跟這風氣相近的，如北川秀則與服部正明。特別是北川氏，其頭腦極具分析性。他們二人對陳那的邏輯與認識論的研究，實在超過西方學者。另外，日本的鈴木大拙在這方面亦值得一提。他是一個學道兼修的禪學者，但亦有文獻學基礎。他是把梵文「楞伽經」譯成英語的第一人，又爲之編一梵、漢、藏索引，雖然他的文獻工作亦不免被新起的學人譏爲疏漏。其英語流暢自然，自不必說。但他比較少用心于文獻，而專走哲學與修習之路。

五、文法書與辭典

從語文我們談到文法書與辭典的編製。這兩者是搞語文的雙軌，缺一不可。這裏所謂文法書與辭典，自然是就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等言。關於這方面，大抵是歐美人的天下。日本人本來善于搞辭典的，但這裏却讓別人獨秀于前。這可能是由于歐美學者已有很好的成果，很難超過他們之故。至于漢文，漢譯藏經自然重要，而中國佛學亦有其自身的發展。但有關漢文的文法書與辭典，在現代的佛學研究中，未受注意。日本學者對漢文的了解，困難不大；而西方學者的佛學研究，又偏重于梵藏巴利方面。故漢文的文法書與辭典，到目前爲止，需要仍不大。

關於梵文文法書，最爲人所留意的，要算上面提到的美國梵語學者 W. D. Whitney 所編寫的「梵語文法」(Sanskrit Grammar,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 Dialects, of Veda and Brahmana)。此書把梵文文法規條，以一千三百餘條表示出來，書後附有梵文索引與普通索引，利便查考。Lanman 氏編的「梵語讀本」(Sanskrit Reader)便處處注引 Whitney 的文法規條。其後 Whitney 以梵文動詞變化太複雜之故，又更編一「梵語之語根、動詞形式及基本導出語」(The Roots, Verb-Forms and Primary Derivatives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)以補其不足。

但 Whitney 之書的編寫方式不便初學。對初學者來說可有以下數書：

1. Max Müller: Sanskrit Grammar
2. E. D. Perry: A Sanskrit Primer
3. A. A. Macdonell: 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

這都是以一般文法書方式編寫成的。但筆者認爲最值得推薦的，無寧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 G. L. Hart 所編的「梵語便捷學習法」(A Rapid Sanskrit Method)。此書有系統地分析地解釋梵文文法的基本規則，每章後附有習題，使人可循序漸進而學。此外，關於佛教混淆梵語的文法，F. Edgerton 的「佛教混淆梵語·文法與辭典」，是這方面獨一無二的大著。

梵文辭典方面，首先要述的是 M. Monier-williams 的「梵英辭典」(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)。這是依語源學的與語言學的次序而編排的大著，特別照顧到同族的那些印歐語言。此書其後有新版，由 E. Leumann 與 C. Cappeller 等學者予以大量補充及修訂。另外，又有 A. A. Macdonell 的「實用梵語辭典」(A Practical Sanskrit Dictionary)，此書篇幅較小，收入字彙不多，但其特點是詳于語源方面的分析。

日本方面，有辻直四郎的「梵文文法」與神亮三郎的「梵語學」。辻直四郎是研究「奧義書」(Upaniṣad)的權威，在梵語方面是名宿。神亮三郎亦是梵語專家，但其成就無寧在編「翻譯

名義大集」(Mahāvyaṅgya)，此是梵藏漢日四譯對校者。要查考相應于梵文原語的藏文或漢文的譯名，此書十分便利。此書與上面提到的荻原雲來編的「梵和大辭典」，是各譯對校工具書的雙璧。後者雖名辭典，其實非一般性者，其字彙皆相關于佛教學方面者。

梵文辭典方面，日本人興趣不大，似乎未有一本如西方方式的梵日辭典出現。但日本人編寫讀本的興趣却甚高。有辻直四郎的「梵文讀本」，其體製做 Lanman 之讀本，但更附日譯，極便讀者。特別考慮到佛教內容的讀本，則有岩本裕的「佛教梵語讀本」與奈良康明的「梵語佛典讀本」等。

梵文辭典除上面列舉的兩本比較流行的外，尚有不少。這二書皆是以英語解釋者。除此外，尚有梵德、梵法，及印度學者整理的辭書。筆者未習法語，梵德辭典未用過，中國學者大抵很少用這方面的資料，故從畧。印度方面的要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談。下面亦大抵只就英、日解釋而介紹巴利、藏文的文法書與辭典。

巴利語文法書有 W. Geiger 以德語寫成的「文學與語言」(Literatur und Sprache)，其後 B. Ghose 譯成英語，名爲「巴利文及語言」(Pāli and Language)。辭典方面則有英國學者 R. C. Childers 編之「巴利語辭典」(A Dictionary of the Pāli Language)。其後 T. W. Rhys Davids 以此書不能滿足其巴利經典學會之需，乃與 W. Stede 更編「巴利辭典」(Pāli-English Dictionary)，此是一大規模之辭典。另外日本南方佛教學者水野弘元氏在這方面貢獻亦甚大，他先後編有巴利文的文法書及辭典，又編讀本。

西藏語文法書有 Herbert B. Hannah 所編寫的「西藏語文法」(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)。此書兼顧到古典的與通俗的兩方面，解說亦清楚明瞭。惜取例多用耶教經典語，而譯成藏文。大抵作者是耶教徒。筆者以爲此舉實在不必，蓋西藏是另一系統的宗教也。筆者所從遊的啦嘛 Kalsang 氏，對此便大爲不滿。另外有舊出的 H. A. Jäschke 編的「西藏文法」(Tibetan Grammar)，較前書精簡。書後並附有 John L. Misch 所增補的

閱讀資料及字彙表，甚便初學者。辭典方面，有 Jäschke 之「藏英辭典」(A Tibetan-English Dictionary)，附錄有英藏字彙對照表。

印度學者在研究西藏語言方面有輝煌成績，這裏因文章題目所限不擬多談。

日本方面研究西藏語的學者亦不少，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強調語法，而不重視語音。故一般學者多能看藏語的書，但不能以藏語交談。文法書當首推稻葉正就的「古典西藏語文法」與「西藏語古典文法學」。稻葉氏是西藏古典文法學者，能說流利藏語。此外尚有其他學者的著書，不多錄。藏語辭典方面，尚未多見，似乎只有芳村修基編的「西藏語字典」草稿本而已。

六、日本及歐美的佛學研究中心

所謂研究中心是指近期的而言。牛津大學百多年前是梵學研究中心，現在已一蹶不振，只有一兩個教授在東方學院教梵文、巴利文與東方宗教而已，亦無人能透過漢文與西藏文來了解佛學。R. C. Zaehner 是該學院的講座教授，他本人是印度宗教方面研究的權威，著述甚豐。像這樣的情形，這裏不擬多談它。又筆者在這方面的所知，特別在歐美方面，有限得很，這裏只聊盡介紹之責而已。而實際上，這方面的資料，不管是日本的抑是歐美的，是隨時而易的；這是人事變動所使然。

從學術方面著眼，佛學研究中心通常是設于大學研究院內的。歐美的佛學研究，通常設於宗教系或東方學系；日本的大學則多自有佛學系或印度哲學系。一般的佛教團體或組織自然有這方面的研究，但其背景不同，其目標也異，不免有一種拓展教務的歸趨，而影響其學術方面的水平。這種現象在日本最為普遍。因佛教在日本，固然是一種學問，同時是一種宗教，甚至是一種生活。我們這裏所着重的，是純學術的研究，即主要是介紹一些大學研究院的佛學研究中心。

日本佛學的研究根據地大抵分關東與關西兩地。關東的中心在東京，關西的中心在京都。東京大學自南條文雄以來，經高楠

順次郎、木村泰賢、宇井伯壽、宮本正尊、水野弘元、川田熊太郎、中村元等先後主教授位，都把重點放于印度佛學方面。中村元近年退休，仍主東方學院。東大目下有平川彰，為大乘律學專家；田村芳朗專于天台學與日本佛學；高崎直道專擅印度如來藏學；玉城康四郎專于天台哲學與比較思想；鎌田茂雄專于華嚴學。故其天地似乎相當廣濶。另外有不少私立的佛教大學，如駒澤大學等。京都方面，京都大學自提出「場所哲學」的當代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以來，歷田邊元、久松真一、西谷啓治等，都是思想家形態的人物，其智慧都足以照見西東。其中的久松真一是一個很堪注意的人物。他不止是一個禪哲學的思想家，同時亦不倦于潛修禪道。他領導佛教團體如 F. A. S. 協會和茶道之心茶會，要打破舊有的格套，以發掘禪的真髓。其目的是要建構一個新的社會模式。F. A. S. 協會之名，取自其理想社會的三個中心觀念：Formless Self (無相之自我)、All mankind (全人類)、和 Supra-historically (超歷史地)。其整個意思是要覺悟到自己的真我，那個無相的自己，而立于全人類的立場，以成就世界，超越歷史，但卻永恆地創造歷史。這實是流行于日本思想界的一種新的宗教運動。其詳情將具于筆者之另一文「佛學研究與方法論」中。他曾多次與西方哲人如海德格、Paul Tillich 等對談，被認為是東西方心靈的直接交接。另外的西田、田邊、西谷等都不單是理論者，在現實生活中都表現出宗教的情操。但京大至松尾義海與長尾雅人，漸由思想轉向學術。現今的服部正明與梶山雄一，則純粹是學術性。服部氏精于印度論理學，特別是陳那的認識論，他本人有很好的西方哲學基礎。梶山氏長于後期大乘論理學。另外有兩間著名的私立佛教大學，即大谷大學與龍谷大學。大谷前有把禪佛教介紹到西方的鈴木大拙、傑出的文獻學者山口益及西藏學者寺本婉雅。其後有安藤俊雄、橫超慧日教中國佛教，舟橋一哉教原始佛教，櫻部建教阿毗達磨佛教。現今有安井廣濟教中觀學，稻葉正就教西藏學。龍谷大學則似乎比較守舊，以前的芳村修基，是西藏學的權威。

(未完待續)